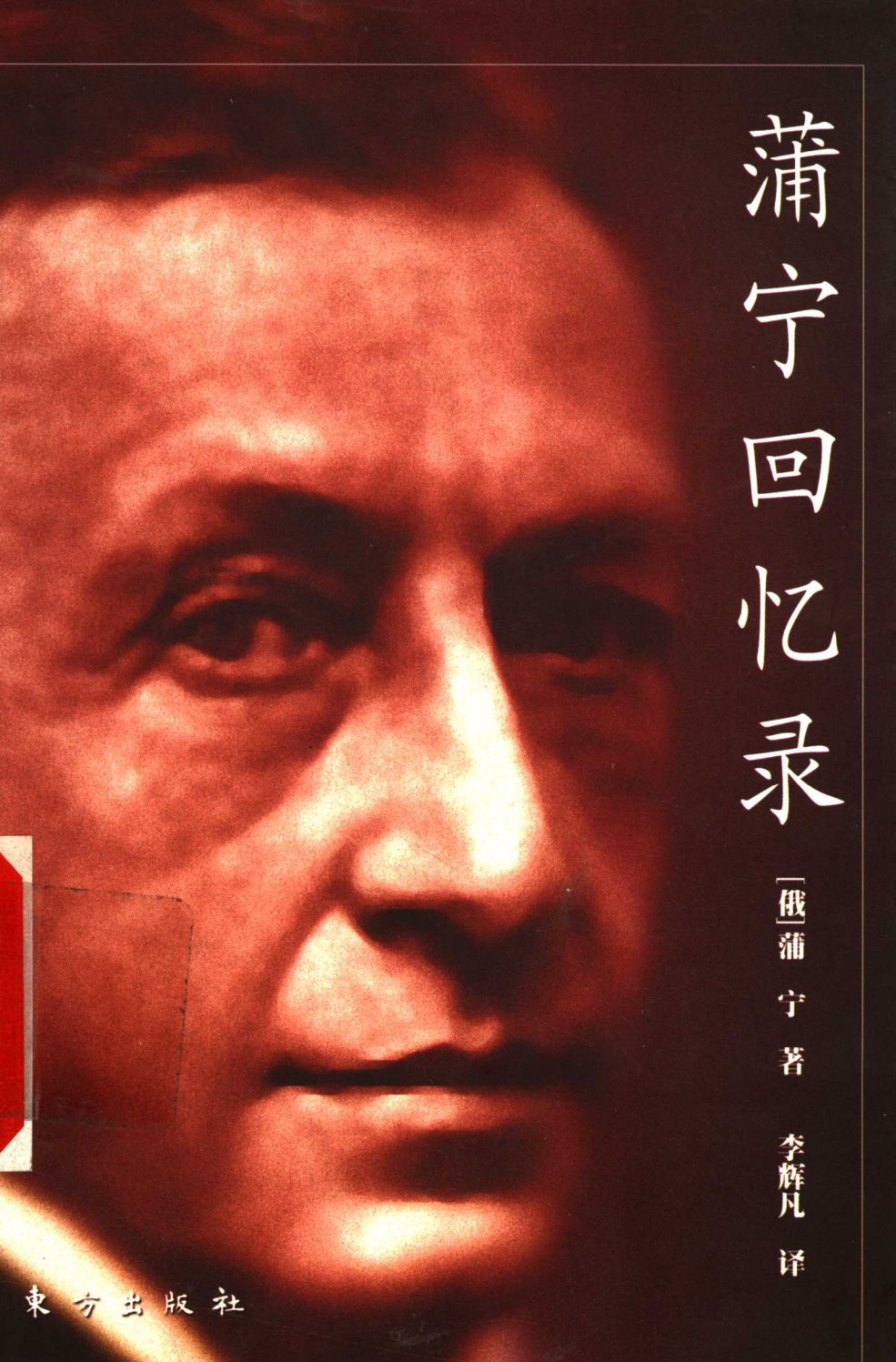




蒲宁回忆录

[俄]蒲宁 著

李辉凡 译

东方出版社

蒲宁回忆录

〔俄〕蒲宁 著 李辉凡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98967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颖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宁回忆录/(俄)蒲宁著 李辉凡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ISBN 7-5060-1548-X

I. 蒲…

II. ①蒲… ②李…

III. 蒲-回忆录

IV. K835.125.6

蒲宁回忆录

PUNING HUIYILU

(俄)蒲宁 著 李辉凡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875

字数:227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060-1548-X/K·334 定价:18.50元

译者说明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是 20 世纪俄罗斯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 1870 年出生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是在农村庄园里度过的(“我从小就在衰败了的贵族之家长大”),由于家境中落,中学没有毕业便被迫辍学,自谋职业,生活十分坎坷。他酷爱文学,自学成才,很早就开始写作。1887 年发表了第一首小诗《在纳德松的坟上》,不久后连续出版几本诗集并开始写小说,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进入文坛后,蒲宁的社交活动增多了,思想视野开阔了。他很早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捷列肖夫等大作家。正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他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青年蒲宁的另一个爱好是旅游。从 20 世纪初开始,他多次出国漫游,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并对东方文化、古希腊文化及基督教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寻访了许多文化古迹,研究过基督教、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等。因此宗教对他的思想发展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广泛的游历也为他的文学写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素材。

蒲宁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革命后,1920 年侨居巴黎。在国外他继续进行写作(侨居期间的主要作品有《米佳的爱情》,《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幽暗的林间小径》等),并于 193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但是他的创作鼎盛时

期是在国内,主要是 20 世纪初的前 20 年。早期作品除大量诗歌外,还有散文小说《两个香客》、《在庄园里》、《金窖》、《安东诺夫卡的苹果》、《矿石》等,他写自己熟悉的农村题材,描绘俄罗斯美好的自然风景,抒发自己独特的感受,并提出不少迫切的农村问题。作家把俄罗斯的命运同农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披露农民贫穷落后的境况。不少作品受到文学界的好评。

俄国 1905 年革命后,他的创作思想日臻成熟,写出了一系列重要作品,如《乡村》、《蟋蟀》、《干谷地》、《从旧金山来的先生》和《兄弟们》等。他用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对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俄国社会生活,特别是农村面貌作了真实而又深刻的描写,表现出作家对祖国对人民深切的关怀和理性的思考,并对贫苦农民寄予了莫大的同情。后两部作品则批判了西方社会,表现了作家的反殖民主义思想。从这些作品里可以看到,蒲宁虽然贵族家庭出身,但在创作上许多方面已突破了贵族阶级的局限:他意识到了旧社会的没落,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内心充满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感情,尽管他并不懂得应当如何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尤其在中篇小说《乡村》里,作家以严酷的客观态度,深刻而全面地再现了血淋淋的俄国农村现实,无情地暴露了俄国贵族地主庄园的败落和社会的解体。

《乡村》的问世曾引起不同的社会反响。有些评论家指责蒲宁用《局外知识分子》的眼光观察农村,用“破落地主老爷的立场”诋毁农民;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蒲宁是“自然主义者”,没有对零散的事实加以概括。而进步思想界则及时肯定了《乡村》。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为您感到既激动又高兴,十分的高兴……还从来没有人如此深刻如此历史地写过农村……正派的人会

说,蒲宁的《乡村》除了其第一流的艺术价值外,还是一种推动力。它迫使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严肃地思考的已不是庄稼汉,也不是人民,而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这一严厉问题。”高尔基对《乡村》的首肯,对于蒲宁的创作生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蒲宁曾十分动情地感激高尔基说:“如果说,我在发表《乡村》之后还能写出一些有用的东西的话,这当然得归功于您,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简直无法想像,您的意见对我有多么珍贵。您真是在我身上洒下了起死回生的仙水!”

客观地说,批评界对蒲宁作品的争议,既反映了评论家们审美视角的不同,也折射出蒲宁本人创作思想和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应当指出的是,高尔基虽然肯定、表扬了《乡村》,但同时也指出了蒲宁其他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例如高尔基在评论他的另一部在思想内容上与《乡村》很相近的小说《干谷地》时,就说过下面一段话:“蒲宁的《干谷地》是一部未做正确评价的书,是一本俄罗斯最可怕的书,里面有着某种安灵弥撒式的东西……在《干谷地》中,蒲宁就像一位已经对上帝的信仰有了动摇的神甫一样,为自己业已死亡的阶级进行追悼,尽管对无力的死者也有愤怒、蔑视,却仍旧怀着巨大的内心的惋惜追悼他们。当然,也是追悼自己。”

蒲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乡村》和《干谷地》在内,写的都不外是破落贵族、新发迹的暴发户——富农、贫穷落后的庄稼人、流浪汉等,一句话,所描绘的都是正在没落的贵族生活和破败的宗法制社会图景。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是各自独立的,没有内在的情节联系,但在作品思想的深层次里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串连着,这就是作者的独特的心态——哀婉和伤逝的情调。也就是高尔基所

说的“某种安灵弥撒式的东西”，“为自己业已死去的阶级进行追悼”。蒲宁自己也不无自嘲地说过：“我被称为是‘歌颂’正在灭亡的贵族之家的最后一批人”。当然，这种评语不一定是贬义。首先它肯定了这些作品是贴近生活的，肯定作品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关系。这就说明作家坚持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正如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时所指出的那样：巴尔扎克政治上虽然是个“正统派”，但是“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另一方面，上述情况也说明了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作家虽然创作了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在思想感情上却仍可能与过去的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蒲宁的情况也可以作如是观。

综观蒲宁的生平和创作，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中的表现，他的世界观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他的妻子薇拉在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按出身他属于一个阶级，但由于家境贫寒和种种遭遇，他是在另一种环境中接受教育的，而他同这种环境又无论如何也不能融洽起来。”蒲宁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命运中这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不论是贵族还是新兴资产阶级——富农都没前途，但是另一方面，庄稼汉又是如此贫困、愚昧、落后……也没有什么出路。当他去追究这些问题时，又不能从社会、历史、阶级矛盾等方面去寻找根源，而是从抽象的人性论中求得答案。他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和弊病——贫穷、落后、战争、革命……都因为普遍人性的丧失、人们精神的堕落，是由于人的虚伪、贪婪、自私、懒惰、残酷等造成的。在他看来，俄国的贵族和庄稼汉的“内心世界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贵族阶层的物质条件比较优裕

而已”，“两者的灵魂都是俄罗斯的”，两者的身上都反映着上述人性和民族性的缺陷。俄国社会危机的原因就在这里。于是他也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力图从人性、道德方面去克服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主张改善人性，道德上的完善，反对暴力革命。这就决定了他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

蒲宁坚决反对十月革命。从1917年夏天起席卷全俄的革命运动使他陷入极度的惶惑和痛苦之中。他把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做是自己的末日：“一切都停息了——所有的障碍物，所有上帝和人间的关卡都倒塌了……胜利者在克里姆林宫上空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在我的整个一生中，从没有比这一天更可怕的日子。上帝有眼，确实是这样。”他完全把自己同覆亡的王朝拴在一起了。1920年他离开了祖国，侨居巴黎。

蒲宁的传记作者阿·巴博列科说：“作家的观点不是政治活动家的观点，这里有另一种尺度”。然而，蒲宁衡量作家的尺度用的却是严格的政治标准。他对同时代作家的评价，首先是看这个作家的政治态度如何，凡是赞成，甚至不明确反对十分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他都将其视为敌人，不管这个作家艺术上有多大的成就，也不管这个作家过去与自己有过多么深厚的交情和友谊。例如他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等都持这种态度。蒲宁在回忆录和文章中对许多人的评论用词激烈，近似辱骂。例如他写道：“马雅可夫斯基具有凶狠、厚颜无耻的、苦役般冷酷无情的天性，具有粗野的喉咙，具有拉大车的马的那种热情及其笨拙的劣诗中粗野无情的平庸。他把这些劣诗冒充为好像是某种新诗，用其来表达他如此热衷的一切丑恶的东西和在俄共及其头头面前的虚伪的喜悦和忠心。”蒲宁对阿·托尔斯

泰也极尽其嘲笑和侮辱之能事。他说过：“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我们是和睦友好的”。但是十月革命后，尤其是阿·托尔斯泰从国外重新回到苏联后，蒲宁对他的态度彻底改变了，说他“品行不端”、“恬不知耻”、“喜欢装成有点傻气的样子”，“是一个狡猾的贪图私利者”；“实在是一个‘阿廖什卡’，‘流氓’”。至于勃洛克、勃留索夫、叶赛宁、别雷等诗人，由于他们对十月革命和新政权持友好态度，蒲宁对他们也特别反感，说什么勃洛克“得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病”，他的《十二个》“千篇一律，近乎庸俗”。叶赛宁的诗是“骗子的抒情诗。这个骗子早把自己的无赖行为变成了有利可图的职业”……

高尔基在革命前对蒲宁的支持帮助，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而十月革命来临时，正是由于不同的政见、不同的世界观，蒲宁坚决与高尔基断绝了来往：“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关系永远结束了”。很长一个时期蒲宁对高尔基都持敌视的态度：“高尔基和安德列耶夫……都是一些歇斯底里病患者，痴呆病患者，疯癫病患者……他们中间哪一个称得上是一般意义上的健康人呢？他们全都很狡猾，他们很懂得，为了自己能引人注目需要做什么。”对高尔基的作品，蒲宁也多持否定态度，例如他认为《马卡尔·楚德拉》“写得少有的庸俗”，《底层》是“浅陋的，彻头彻尾地虚伪”。诚然，到了晚年蒲宁对高尔基的态度有所缓和。1936年当他获悉高尔基逝世的消息时，写了一篇回忆高尔基的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那个把我同高尔基联系在一起的奇怪的友谊……是从1899年开始的，而结束是在1917年。当时我突然发现，这个和我在整个20年中没有任何一条个人仇视理由的人，一下子却成了长期让我害怕、愤懑的敌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仇视的感情又

逐渐消解了,这个敌人对我来说好像并不存在。”蒲宁晚年的思想确实有所变化,他甚至还考虑过回国的问題,但由于当时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行。

本书根据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的《该死的日子》一书译出。原书包含三部分内容:日记(1917—1918 年日记和“该死的日子”)、回忆录、文章。“该死的日子”这一部分因为言辞过于激烈、露骨,本书没有收入。这里还要向读者说明的一点是:由于书中有些文章表现了作家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敌视态度,编译者对个别词句作了删节,但原文总的面貌基本保留,因为我们译介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份研究资料。过去我国只出版了蒲宁的作品,只看到他创作的一面。这本书出来后,我们可以对他的生平、政见、世界观等诸多方面的了解。因此特别是对研究工作者来说,这本书对作家作深层次的认识和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此之外,此书对十月革命初期的苏俄文学生活、对某些作家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和信息。这对我们更全面更客观地考察和了解这个时期的俄苏文学史亦不无裨益。

至于书中的内容和观点,相信我国的广大读者都有足够的审辨力,能够正确地批判地对待的。还要提及的一点是:日记乃是作者每天的见闻、思想、感受的即兴的记录,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前后思想不一定有什么内在联系,有许多地方只留下只言片语,有的甚至还是用缩记法、省略号记的,句子不完整,意思不连贯。因此翻译难度较大,有些句子往往只能靠猜测、补想才能意译出来。加之译者水平所限,译文的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

读者批评指正。

李辉凡

2001年8月于劲松

目 录

自传札记	(1)
拉赫玛尼诺夫	(51)
列宾	(53)
杰罗姆·杰罗姆	(55)
托尔斯泰	(57)
契诃夫	(71)
夏里亚宾	(81)
高尔基	(93)
殿下	(105)
库普林	(115)
谢苗诺夫世家和蒲宁世家	(131)
埃尔杰利	(141)
沃洛申	(151)

“第三个托尔斯泰”	(165)
马雅可夫斯基	(197)
诺贝尔奖金日	(207)
想到普希金	(217)
关于普希金的讲话	(229)
1917—1918 年日记	(231)

自传札记

早在 15 年前,我已把它主要与我写作生涯有关的某些自传札记登载在柏林彼得罗波利斯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文集里了。

我现在对它们作一些新的补充。

(着重点全部是我加的。在从新正字法写的诗歌和散文小说里做摘引时,我还用旧正字法写出。)

我的写作生涯的开端是颇为奇怪的。它大概是在许久许久以前的一天,在奥尔洛夫省我们的农村庄园里开始的。当时我是一个 8 岁的小孩子,突然感觉到有一种立即创作某种诗歌或童话之类的令人不安的热切愿望,因为我忽然被偶然在一本插图小书中发现的东西惊倒了:白色的瀑布,一个敦实矮胖的乡下人;这个矮人有一张农妇的脸,脖颈肿大,亦即害了气瘰脖病;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手杖,站在瀑布下面;他戴一顶像是女人用的小帽子,帽缘插着羽毛。图画下面有签字,它的最后一个词(幸好当时我不认得)使我大吃一惊:“在山上与呆小病者相会。”呆小病者!如果不是这个不同寻常的词,那么害气瘰脖病、有一张农妇的脸和戴着像女人用的帽子的矮人,大概我只会觉得非常讨厌,再没有什么了。但是,呆小病者呢?在这个词里我感到有一种可怕的、莫名其妙的、

甚至好像神奇的东西！于是我突然被诗的激情完全控制了。这一天白白过去了，不管我多么卖力地写，却连一行诗也没有写出来。可是，这一天不仍旧是我创作活动的某种开端吗？

无论如何可以认为，那一天碰到这幅画——对于我来说，好像是某种预兆，因为在我后来的整个一生中也曾不少次亲自遇见过呆小病者，虽然没有气瘰脖，外表也是相当讨厌的，他们中有些人全然不是妖魔，但却实在可怕，特别是这种或那种呆小病的措施同他们任何巨大的才能和耐力结合起来，同任何歇斯底里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时候，——因为，众所周知，这在现在、过去和未来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中都是常会发生的。那又怎样呢！总之，我是注定了要过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的，所以我甚至成了那样一些呆小病者的同时代人，这些人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世界史册上——他们是那些摧毁了全部的帝国、消灭了几百万人的生命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

我出生在沃罗涅日州，在那儿我整整住了3年。此外有一回我还消遣了一个通宵。不过，我对沃罗涅日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在那儿度过的那个晚上我并没有看见它：我被沃罗涅日大学生同乡会邀请去为该同乡会捐款的慈善晚会上讲演。我是在一个阴暗的冬日的黄昏，在暴风雪中抵达的。在车站我就受到了香槟酒的欢迎，在晚上也吃得很多，在天亮前又用车把我送到火车站去赶莫斯科的火车时，我已经烂醉如泥了。我在沃罗涅日度过的这3年，就是我的幼年时代。

后来双亲把我从沃罗涅日带到了奥尔洛夫自己的庄园里，从

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记事了。这里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在这些年代,声名狼藉的贵族的“衰败”已成定局。用这个标题,现在已被遗忘的捷尔皮戈列夫-阿塔瓦^①曾经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在他之后便是我,我被称为“歌颂”正在灭亡的贵族之家的最后一批人;然后是契诃夫“歌颂了”樱桃园的被毁灭了的美。契诃夫对贵族地主、贵族庄园及他们的花园了解甚少,但他现在都还以其《樱桃园》的虚假的美迷惑着几乎所有的人。契诃夫贡献了许多真正美好的东西,为此我认为他是最卓越的俄罗斯作家,但是我不喜欢他的戏剧。这里我甚至为他难为情。我不愿意提起这个著名的万尼亚舅舅,阿斯特罗夫医生,这个人老是牛头不对马嘴地唠叨什么造林的必要性。那个加耶夫则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贵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了表现他的贵族派头,老是令人讨厌地、十分做作地用软洋纱手绢洗擦指甲。那个直接采用果戈理人物的姓的地主——西米奥诺夫·皮希克就更不用说了。我从小就在“衰败了的”贵族之家长大。这是一个偏僻的草原庄园,但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只是它不是樱桃园,因为,与契诃夫的愿望相反,在俄罗斯,任何地方也不曾有全是樱桃树的花园。在地主们的花园里只有某些部分是樱桃树,有的甚至有很大的面积长着樱桃树,但任何地方的这些部分(又是与契诃夫的意愿相反)都不可能正好就在老爷宅院的旁边。过去和现在樱桃树都没有什么奇异的地方,众所周知,它一点儿也不美,粗糙弯曲,叶子很小,开出来的花也很小(全然不像艺术剧院里老爷宅院窗户下面长得那么壮实和茂盛),而且完全不

^① 谢·尼·捷尔皮戈列夫,笔名阿塔瓦(1841—1895),俄国政论家、作家。

可思议的是，罗巴辛甚至还没有让旧房主搬走之前就如此愚蠢地亟不可待地下令砍掉这些有利可图的树木。罗巴辛之所以需要如此匆忙地砍树，显然只是因为，契诃夫想让艺术剧院的观众有可能听到斧子砍树的声音，亲眼看见贵族生活的覆亡。幕落时费尔斯说：“他们都把我忘了……”这个费尔斯是写得相当近乎情理的。不过那也仅仅是因为，老爷的老奴仆的典型在契诃夫之前已经被写过一百次了。其他的，我重复一句，则简直令人难受。加耶夫像契诃夫其他剧作中的某些人物所做的那样，不断地在谈话中跟人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像他玩台球一样：“打黄球进中兜……”达布列特“进角兜……”郎涅夫斯卡雅好像是女地主，又好像是巴黎女人，经常歇斯底里地又哭又笑：“多么美丽的园子啊！这一丛一丛的白花，上边衬着这一片碧蓝的长空！幼儿园啊！我的亲爱的、美丽的幼儿室啊！（哭泣）这个亲爱的老柜橱啊！（吻柜橱）这张可爱的小桌子啊！哦！我的童年，我那纯洁而快活的童年啊！（愉快地笑起来）满园子全是白的，全是白的！哦，我的樱桃园啊！”接下去——完全与《万尼亚舅舅》如出一辙——是安尼雅的歇斯底里：“妈妈，妈妈，你哭了？妈妈，我亲爱的、美丽的好妈妈，我爱你……我祝福你！樱桃园卖出去了，但是，用不着哭啊！……咱们另外再去种一座新的花园，种得比这一座还美丽……一种平静、深沉的喜悦也会降临在你的心灵上，就像夕阳斜照着黄昏一样。到那时候，你会微笑的，妈妈！”和这一切在一起的是大学生特罗费莫夫，他有几分像“海燕”，“前进啊！”——他喊道，“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远方，像那颗明星那么闪耀的新生活迈进！前进啊！朋友们！不要迟疑！”

郎涅夫斯卡雅、妮娜、札烈奇娜雅……甚至这一类的姓名就使